

蒙古语文与清朝经略中亚*

英卡尔·巴合朱力**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 清朝在统一天山南北以及与中亚各部族政权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蒙古语文在中亚的地位和作用,使蒙古语文成为相当重要的沟通语言工具。蒙古语文在清朝与中亚诸部族政权沟通交往环节中所扮演的语言媒介角色,亦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清代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本文廓清清朝颁给中亚各部族统治者蒙古文敕谕的历史背景,并展开讨论蒙古语文在清乾隆朝统治新疆、经略中亚时期所发挥的沟通媒介作用。

[关键词] 蒙古文 中亚 清朝 浩罕 敕谕

[中图分类号] K249;H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23)03-0056-09

本文探讨清朝和中亚诸部族政权进行交流的语言媒介——蒙古语文。满洲人接触西藏之始,即仰赖于蒙古语文作为中介。^①随着清朝西北经略的推进,蒙古文亦扮演了重要的沟通媒介与文化枢纽角色。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前后,清朝陆续与哈萨克、浩罕、布鲁特(即柯尔克孜)以及巴达克山等中亚诸部族政权建立了相当紧密的联系。伴随这种高密度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接触,其历史遗产之一便是留存至今,且数量可观的多语言档案文献——满文奏折和蒙古文、察合台文信件等“遗留性史料”,实为考察清朝与中亚诸部族间文书交流议题的直接证据。学界对清朝和中亚诸部族政权交往语言媒介问题的研究聚焦于察合台文和波斯文,鲜少关注蒙古文。^②然而,清朝与中亚各部族沟通交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满、蒙、察合台文史料所见清乾隆朝与中亚诸政权关系研究”(23CZS044)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英卡尔·巴合朱力(1991—),女(哈萨克族),北京大学历史系博雅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

① 乌云毕力格:《蒙古语文在清代西藏——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清代蒙古文公牍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30-37页。

② (日)濱田正美:《北京第一歴史档案館所蔵コーカンド関係文書9種》,《西南アジア研究》68(2008),第82-111页。NODA Jin, ONUMA Takahiro,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Tokyo, 2010. David Brophy, “High Asia and the High Qing: A Selection of Persian Letters from the Beijing Archives,” in Alireza Korangy and Daniel J. Sheffield eds, *No Tapping around Philology: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Wheeler McIntosh Thackston Jr.’s 70th Birthda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pp.325-367.

环节中,蒙古语文曾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尝试廓清清朝颁给中亚各部族统治者蒙古文敕谕的历史背景,并展开讨论蒙古语文在清乾隆朝统治西域、经略中亚所发挥的沟通媒介作用。

一、中亚蒙古语文历史背景与清朝西北经略的推进

卫拉特人曾深刻影响了天山东部、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卫拉特自明初以来雄踞西北,号称“四卫拉特”。1678年(康熙十七年)四卫拉特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绰罗斯氏噶尔丹(1644年—1697年)称“博硕克图汗”,建立准噶尔汗国。其时,天山以南地区(包括吐鲁番、哈密)处于察合台后王建立的叶尔羌汗国(1514年—1680年)的统治之下。噶尔丹统治时期(1672年—1697年)不断向中亚诸部族发动军事扩张的同时,挥兵南下攻灭叶尔羌汗国,将天山以南地区置于准噶尔的统治之下,一度成为西域最强大的政治势力。^①由此,蒙古文化因素嵌入天山南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如准噶尔统治者对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阶层授予特殊的官号——达尔汉。达尔汉是一漠北历史悠久之官号,蒙古人尝以其授予有恩于汗者。^②维吾尔伯克额贝都拉和莽噶里克二人,都曾被准噶尔统治者授予“达尔汉伯克”的头衔。^③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广泛参与准噶尔的外交和商业活动。噶尔丹麾下就有大量维吾尔人供其驱使,其中有些还成为准噶尔与清朝外交的使者。^④值得注意的是,出使清朝的准噶尔使团就有通晓蒙古语的穆斯林商人。康熙三十七年(1696年),遭噶尔丹驱逐的察合台汗系后裔阿卜都里什特携书信抵达北京。^⑤正是在一名通晓蒙古语的穆斯林使者的协助下,内阁蒙古房译员将阿卜都里什特书信翻译呈览康熙帝。该书信经历了双重翻译流程:蒙古房译员在穆斯林商人的协助下,先将书信翻译为蒙古语;然后再将其蒙古语文本翻译为满文。这说明,清朝与天山南路地方统治者接触之始,蒙古语文便成为沟通二者的重要媒介。

蒙古文及蒙古文化因素在天山南北根植很深。与准噶尔长期对峙的同时,清朝的权力也逐渐向哈密和吐鲁番地区推进。哈密的统治精英额贝都拉寄往清朝的第一份书信,即以蒙古文书写。^⑥额贝都拉深谙蒙古的社会和政治传统,他在书信中尊称康熙皇帝为“圣主”(boγda ejen)。维吾尔伯克所体现出的蒙古社会和政治特性,曾使康熙帝认为“回子风俗与蒙古无异”^⑦。因此,额贝都拉归附后,清朝对其施以与蒙古诸部相同的札萨克旗制度。不止是统治阶层的公文文书,蒙古文词汇还嵌入民间创作的察合台文文献。十八世纪中后期成书于伊犁的一部察合台文诗集内有大量蒙古文词汇,进而证

① 刘正寅:《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天山南路(1680—1697)》,《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第73~79页。

② 韩儒林:《蒙古答刺罕考》,引自《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③ 王希隆:《哈密、吐鲁番和库车的达尔汉伯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76~81页。

④ (苏)伊拉·亚科夫列维奇·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4页。Onuma Takahir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unghars and the Role of Bukharan Merchants”,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Vol.2 (2011), pp. 83~100.

⑤ 《阿卜都里什特、额尔克台吉二人被噶尔丹所擒受辱十四年,今被清朝遣使护送归国而谢恩之事呈康熙帝奏文》,康熙三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5册,第489~491页。《阿布都里什特、额尔克台吉为洪台吉遣其原籍之事呈康熙帝奏文》,宝音德力根、乌云毕力格、吴元丰主编:《清内閣蒙古堂档》第16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⑥ 《哈密扎萨克额贝都拉达尔汉白克为亲自觐见康熙帝及策妄阿喇布坦未伐哈萨克等事致清朝将军之文书》,康熙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宝音德力根、乌云毕力格、吴元丰主编:《清内閣蒙古堂档》第15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6~519页。

⑦ (清)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6,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112~1114页。

实了通晓蒙古语的穆斯林文士不乏其人。^①随着清朝西北经略的不断推进,蒙古语文在清朝沟通中亚各部族的关键媒介作用愈加突出。

蒙古文在准噶尔统治时期曾是中亚东部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满洲人接触中亚诸部族之始,蒙古语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沟通媒介角色。哈萨克人与卫拉特蒙古人长期混融共存于欧亚草原。尽管哈萨克各玉兹与准噶尔政权频频相互攻伐,但二者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卫拉特蒙古人与哈萨克人之间通婚现象普遍,比如准噶尔部统治家族成员罗布藏舒努与哈萨克小玉兹首领阿布勒海尔汗产生了姻亲关系,^②哈萨克中玉兹统治者巴拉克苏丹的一位夫人是卫拉特蒙古人。^③随着准噶尔内乱、清朝平定准噶尔,以及哈萨克人在七河地区和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军事活动,大批卫拉特人逃至哈萨克,加速了哈萨克与卫拉特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通晓哈萨克语的卫拉特人不乏其人,相应地,同卫拉特人一起生活的哈萨克人也出现了掌握托忒蒙古文者,为清朝与哈萨克的接触、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相关史实证明,清朝与哈萨克接触之始,蒙古语和蒙古文便成为两者之间的“金桥”。清朝使用蒙古文与哈萨克交流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雍正十年(1732年),且与该年满泰出使土尔扈特有关。其时,准噶尔和土尔扈特矛盾对立,清朝专门派遣满泰等人出使土尔扈特,试图远交欧亚草原西段的土尔扈特人、哈萨克人以铲除准噶尔势力。^④清朝致哈萨克的第一份敕书即以托忒蒙古文撰写。雍正十年(1732年),满泰在出使土尔扈特期间实现了与哈萨克使臣扎古斯塔(jagusta)面对面接触的同时,亦了解到哈萨克亦有懂蒙古文字之人,随即将托忒蒙古文敕书直接交予哈萨克使臣。^⑤由此,清朝得以认知蒙古语文在中亚的媒介作用。现存的档案文献证实了哈萨克首领可借助蒙古文与清朝直接交流,哈萨克阿布赉汗本人即通晓蒙古语文。^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哈萨克寄往清朝的第一份正式公文以托忒蒙古文撰写。据统计,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哈萨克致清朝的公文至少有16份为蒙古文写成。^⑦可以说,蒙古语文成为清朝与哈萨克早期交往最重要的沟通媒介。

准噶尔对乌兹别克人所建浩罕伯克政权的政治影响也很深,甚至通过武力干涉浩罕伯克易位。进言之,蒙古语文对于浩罕首领而言,也并不陌生。十八世纪费尔干纳盆地若干城邦政权当中,最为强盛的就是浩罕。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尔大举进兵费尔干纳和巴达克山地区。1742年(乾隆七年),据清朝获得的情报称,噶尔丹策零曾发兵二万征讨浩罕。^⑧1745年(乾隆十年),准噶尔甚至将浩罕王

① David Brophy, “Mongol—Turkic language contact in eighteenth century Xinjiang: Evidence from the Islāmīnāma”, *Turkic Languages*, Vol.15, 2011, pp.51-67.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1页。

③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哈萨克王阿布勒必斯病故选其子杭霍卓袭王位折》,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5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

④ 乌云毕力格:《小人物、大舞台与大角色:罗布藏舒努和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汗国与清朝关系》,《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8页。

⑤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4~248页。

⑥ 同上。

⑦ Bakhyt Ezhnkhani—uli, “The Intermediary Function of the Oirat Language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Kazakh Tribes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QUESTIONES MONGOOLORUM DISPUTATAE*, Tokyo, 2019, p.51.

⑧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自准噶尔来投土尔扈特和通等人送往杭州安置折》(乾隆七年十一月初八日),厉声、吴元丰主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0页。

子巴巴伯克作为人质带走。^①1751年(乾隆十六年),浩罕首领阿卜都尔噶里木逝世后,准噶尔通过军事威胁将巴巴伯克推上了王位,并且获得了短暂的成功。^②但巴巴伯克归来,引起浩罕统治阶层内部的强烈反抗。其结果便是巴巴伯克被处死,额尔德尼伯克再次登上了浩罕王位。清朝档案文献披露,准噶尔地方政权覆亡后,有千余厄鲁特人主动逃往或被动流入费尔干纳地区。他们被浩罕充作军队,成为浩罕军队的重要战斗力。^③由此可见,即便是位居中亚南部费尔干纳一带的浩罕,亦不乏使用蒙古文的条件。总之,清朝使用蒙古语文与中亚部族交往交流的现象,侧面反映了中亚各部族间语言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形。

二、敕谕与清朝的中亚经略

蒙古文是清朝与中亚部族进行公文交流最重要的文字。清朝最初向哈萨克、布鲁特颁发的敕谕为满文、蒙古文合璧。^④尽管当时哈萨克人和布鲁特人中不大可能有懂满文的人,但清朝有意将满文纳入敕谕中,显然是出于强调满文“官方语言”地位的政治考量。与此同时,清朝继续发挥蒙古文的实际功用。清朝档案文献反映,清朝颁给中亚浩罕、巴达克山以及爱乌罕等部的敕谕,为满文、蒙古文和回文(察合台文或波斯文)合璧。这说明,蒙古语文仍然是清朝与中亚各部族交往初期的重要语言媒介。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在中亚地区树立起强大的形象。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哈萨克首领阿布赉会见清朝使臣时说:“我等听闻,日出方向的满洲汗强大,日落方向的控噶尔汗强大。”^⑤清朝在与浩罕、布鲁特及巴达克山等部建立联系之初,分别对其颁发敕谕,表现出保护者的姿态。这为中亚各部寻求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争取更多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浩罕首领额尔德尼伯克在与清朝建立联系之初,就强烈请求颁发敕书:“我愿率领我所管之安集延、玛尔噶朗、纳木干、浩罕四城人众为大皇帝臣仆,惟我附近一带居住之布鲁特等,生性无定。现若蒙大皇帝赏给我一钤印黄札,我管束我之人、防备约束附近一带之布鲁特等时有力,且布哈尔以东人众听闻,亦俱将归附大皇帝也。”^⑥进言之,敕谕作为清朝权威的视觉表达,也成为中亚各部所希冀和争相攀附的政治资源。正如清朝边臣注意到,“近几年留意观察外藩人习性,其接领我方所发钤印文书,甚为敬重,所饬交诸事,皆恭顺办理,其邻部人等听闻,亦视伊等体面。”^⑦

十八世纪中后期,中亚并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浩罕和布鲁特等中亚部族政权间时有

① SCOTT C.LEVY, *The Rise and Fall of Khoqand 1709—1876: Central Asia in the Global Age*, p33.

② 《吉尔吉斯和吉尔吉斯人史料集》,转引自潘志平著:《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③ 《自安集延逃来厄鲁特等送伊犁安置及其所供浩罕情形折》,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初七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6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3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将回文托忒文之上谕恭呈预览后装匣咨送兆惠处》,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档案号:03-0177-1682-031。

⑤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闻努三等会见阿布赉并晓谕擒拿阿睦尔撒纳情形折》,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9~406页。

⑥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安集延浩罕等遣派使臣修书投诚折》,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115页。

⑦ 《伊犁将军明瑞奏令喀什噶尔帮办大臣柏琨派人给浩罕布鲁特赉送札付片》,乾隆三十年四月十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73册,第220~221页。

纷争,涉事方常向清朝求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浩罕与布鲁特发生土地纠纷,浩罕以武力霸占布鲁特额德格纳部之鄂斯地方。额德格纳首领阿济比,继而向清朝求助。清朝认为,浩罕与布鲁特皆为“一体内附之人”,不可以强凌弱,行文敦促浩罕退还鄂斯。^①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派遣员外郎挖穆齐图及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等人赴浩罕,向额尔德尼索还所侵额德格纳部之鄂斯地方。据永贵奏称,额尔德尼履约付还。^②但永贵并未反映事实,其后不久,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告发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私通霍罕伯克额尔德尼、相约滋事之罪行,而挖穆齐图也供称额尔德尼确实并未远迎。^③清朝查明此案后,以阿布都喇伊木犯“交通外藩,希图叛逆”将其凌迟梟示;对于使臣挖穆齐图,则摘去其孔雀翎,交部严加议处。^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七月,清朝向浩罕额尔德尼伯克颁发敕谕曰:

赐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敕书曰,从前喀什噶尔驻扎大臣,遣章京挖穆齐图率同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谕尔给阿济比鄂斯之地。阿布都喇伊木潜遣其亲信郭帕和卓等,致书于尔。谓回部和卓木等,皆见诛戮,惟尔尚存,此次索还侵地,来使不过数人,未曾派兵,尔但示以不惧,勿出迎候,且喀什噶尔等城,留兵甚少,尔地领众前来,我为内应等语。尔亦权词相答。谓现与丕色勒构难,俟可行时,再相约会。此等情节,皆经发觉,审讯明确,故将阿布都喇伊木等,立置重典,家口亦从坐。大臣等以尔心怀叵测,请发兵问罪。朕思阿布都喇伊木,向随霍集占等为逆,本应诛戮,因其献城纳款,是以加恩录用,今负恩谋叛,孽由自作。尔归附以来,颇知恭顺,此次一得逆书,若缓言相复,则与逆犯结约,原非尔本心,朕观尔行止尚属晓事。设尔竟如所约,袭取喀什噶尔,岂不思叶尔羌、阿克苏、和阗皆有官兵,伊犁有将军大兵驻扎,尔能守喀什噶尔乎?恐大兵一至,霍罕、安集延尽皆殄灭,悔之何及?尔盖筹计及此,故数月以来,并未私遣一信,知尔不敢负朕恩,而罪尚逭也。今已谕驻扎大臣等,不必进兵,尔荷朕包荒大度,当益加恭顺,恪守藩服,以期永保福禄于无穷。倘有不逞之徒,以叛逆之事诱胁尔者,即据实以闻,勿为所愚。特谕。^⑤

阿布都喇伊木事件令乾隆帝大为震怒,将其凌迟梟示。该敕书也是一份训谕,前半部语词严厉,甚至提到“大臣等以尔心怀叵测,请发兵问罪”的话,但后文一转说“知尔不敢负朕恩,而罪尚可逭也”。换言之,清廷尚不愿为此轻易动武,但有必要严厉警告额尔德尼“恪守藩服”。

清朝注重选派熟悉蒙古文化和习俗的官员出使浩罕。乾隆帝非常重视此次赉送敕书人选,要求使臣“务必贤能可信”^⑥。不过,获悉纳世通派员外郎四十七、蓝翎侍卫官长保等人出使浩罕,乾隆帝谕曰:

赉送敕谕,应派明白可信、尚知满洲礼节之人。四十七,久在汉人地方任职,并未习熟军营蒙古习俗,亦挖穆齐图之流,岂能办事?^⑦

① 《清高宗实录》卷678,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中华书局,1987年,第589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684,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丁酉,中华书局,1987年,第657~658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707,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癸酉,中华书局,1987年,第897~898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715,乾隆二十九年七月丙寅,中华书局,1987年,第974~975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715,乾隆二十九年七月丙寅,中华书局,1987年,第974~975页。

⑥ 《寄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著将派何人向浩罕赉送敕书之情具奏》,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85~586页。

⑦ 《寄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等著派舒常前往浩罕赉送敕谕》,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88页。

由此可见,清朝十分注重使臣的出身。乾隆帝认为纳世通所办“尤为非体”^①。乾隆帝明确指出,此敕谕“系加恩宽免额尔德尼之罪”,使臣前往浩罕当严词斥责额尔德尼。^②总之,乾隆帝认为纳世通的相关安排“甚属错谬”^③,继而再度谕令纳世通将四十七等人出使具体情形,俟其返回速行奏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奏折内所附四十七出使报告,详细记载了此次出使赉送敕书的经过。^④四十七出使浩罕赉送敕书顺利完成,维持了清朝的权威地位。而经过这些事件,清朝终于意识到额尔德尼伯克“从前不曾出迎我遣使,且与阿布都喇伊木互通信使”^⑤,继而断定额尔德尼“乃非安分之人”^⑥。另一方面,乾隆帝认为驻扎大臣等官员在处理相关事宜时,应当更为严厉果决。由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办理此事,始终怯懦,凡事唯求了事,未能尽心”,乾隆帝继而降旨曰:

喀什噶尔回子事务繁多,应照蒙古情形办理。柏琨熟悉蒙古语,著赏给副都统职衔,前往喀什噶尔,协同纳世通办事。^⑦

按照清朝制度,治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大臣除满洲人就是八旗蒙古出身的官吏。乾隆帝派遣熟悉蒙古语的官员柏琨前往喀什噶尔,命柏琨务必协助纳世通“果敢办理,毋再以姑息从事”。^⑧由此可见,蒙古文不但在清朝与中亚诸部的沟通交往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功用,而且对清朝统治新疆也相当关键。

三、蒙古语文在清朝与中亚诸部交往的实际功用

随着清朝与中亚各部族的交往交流加深,相应的文书处理机制日趋完善。为保证文书的转译,清朝也开始注重培养、选用译员。尽管中亚各部族寄往清朝的公文以察合台文和波斯文撰写居多,但蒙古语文和蒙古文化因素在清朝与中亚各部族间的公文措辞、遣使、信息流通等环节从未或缺。

清朝与中亚诸部均在往来公文书写沿用来自蒙古语世界的“主—仆”(ejen—albatu)概念及术语。清朝在短时间内与中亚各部建立联系,并构筑其权力与信息网络,亦得益于对准噶尔政治遗产的继承与利用。所谓准噶尔政治遗产主要包括准噶尔地方政权覆亡后所遗留的语文、政治逻辑与政治术语等,^⑨在清朝与中亚诸部早期交往交流中成为各方均不陌生的概念工具。中亚各部族寄往清廷的书信中,对清朝皇帝的联合性称谓——“额真博格达汗”(“ezen boğda han”),其对应蒙古文为

① 《寄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等申飭伊所办事宜甚属错谬》,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5册,第591~59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潘志平:《四十七使浩罕·霍罕路程·浩罕界》,《欧亚学刊》总第2辑,2000年,第163~181页。

⑤ 《寄谕参赞大臣纳世通等著将布鲁特与哈萨克是否媾和等情密访具奏》,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99~600页。

⑥ 同上。

⑦ 《寄谕参赞大臣纳世通著派柏琨前往喀什噶尔协同办事》,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92页。

⑧ 《寄谕参赞大臣纳世通等著申飭办事怯懦》,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03页。

⑨ David Brophy,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3(2), 2013, p.243.

“ejen boyda qayan”。“额真”“ejen”为主上、主人之意，而“boyda”意即神圣。这种修饰性尊称，在准噶尔首领寄往清朝书信中屡见不鲜。“ezen—albatu”对应满文为“ejen—albatu”，字面含义为“主上一臣仆”。“ejen—albatu”是蒙古社会基本的纽带之一，无论是平民之于“诺颜”（“noyan”）或“诺颜”之于可汗，凡向其“领主”（“ejen”）纳贡者皆称为“albatu”，只不过后种情况下不具从属性。^①在内陆亚洲情境，主上（ejen）的地位意味着权力与义务，即臣仆认可主上的权威，同时要求主上对其负责。^②然而，清朝君臣所理解的“主一仆”更近似于单向的顺服，并无保护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受到中原政治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③清朝不干涉、不介入中亚各部族纷争的诸多事例即为例证。因此，“主一仆”概念内涵的变迁，以及不同历史时空所呈现的认知差异问题应予以重视。

清朝在蒙古文化情境下认识和了解中亚各部族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赴京朝觐的哈萨克使臣卓兰在回答清朝官员对哈萨克统治阶层内部状况的询问时称：“我等哈萨克把台吉骨头的人皆称作苏勒坦。”^④那么，这对于熟悉蒙古社会的清朝来说便不难理解了。“台吉”（“taiji”）在蒙元时期指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源自汉语“太子”一词，是蒙古游牧社会固有的传统爵号。内外札萨克蒙古汗、亲王之子，被清廷授为公品级、头等台吉，此类爵职成为他们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鉴于此，清朝将那些亲自赴京朝觐哈萨克“托烈”（亦即白骨阶层成员）比附为“头等台吉”或“台吉”。正如清廷笔吏所言，“阿布赉侄，其名都勒特赫勒，‘苏尔统’盖其贵族之称，如蒙古之‘台吉’云。”^⑤由此观之，蒙古文化因素深刻影响了清朝对哈萨克社会的认识。

卫拉特蒙古人成为清朝沟通中亚的重要联络人。通晓哈萨克语的厄鲁特人，在清朝与哈萨克交往交流环节中扮演了使臣、通事等关键角色。随着准噶尔部内乱，部分逃往哈萨克的厄鲁特人，被哈萨克统治家族收为家臣，派往清廷朝觐或交涉双方事宜。名为布鲁特（burut）的厄鲁特人是哈萨克阿布勒比斯苏勒坦的家臣，他屡次作为哈萨克使团成员赴京朝觐。布鲁特与清朝边臣互动相当密切，是沟通哈萨克与清朝之间重要的联络人。1771年至1775年间，布鲁特向清朝提供了关于土尔扈特东归、哈萨克军事动向等方面的关键情报。^⑥另外，清朝还注重从厄鲁特营挑选精通哈萨克语的厄鲁特人为通事，负责处理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等事务。沙勒哈勒岱（sarhaldai）是清朝塔尔巴哈台厄鲁特营的通事，他的哈萨克语相当流利，清朝边臣颇为倚赖他。伊犁将军通过询问沙勒哈勒岱，及时了解哈萨克内部政治情势。^⑦

卫拉特蒙古人作为中亚地理信息的承载者，成为清朝了解中亚各部政治局势、风土人情的重要信

① (苏) 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48~270页。

② David Sneath, *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 Kin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94~195, p.235.

③ 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2~125页。

④ 原文为：“meni hasak de taiji giranggi niyalma be gemu sultan sembi”，载《军机处奏查哈萨克汗世袭源流片》，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

⑤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卷44。

⑥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奏报土尔扈特回归及哈萨克汗阿布赉动向片》，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0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奏报哈萨克侍卫布祿特呈报哈萨克情形片》，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0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⑦ 《伊犁将军舒赫德奏查哈萨克博罗特如何称汗情形折》，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八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0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2~214页。

息源。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后,流散在中亚各地的卫拉特人辗转投归清朝,他们凭借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为清朝提供边外局势的关键信息。因此,清朝边臣在安置投归厄鲁特人之前,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对其进行详细的询问以录取口供。通过厄鲁特人提供的信息,清朝及时获悉哈萨克草原、费尔干纳盆地及塔什干的政、军及外交动态。^①例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朝通过询问从中亚投归的厄鲁特人,获悉哈萨克、浩罕等中亚部族“以白帽子部落联手图强”^②之事。同年,自浩罕投归清朝的厄鲁特人,透露浩罕的军事动向与军队构成情况。^③另外,伊犁的厄鲁特营通事图鲁孟克(turumengke),在清朝搜集中亚信息环节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伊犁将军令图鲁孟克“从闲谈中访问哈萨克等”,及时获悉阿布赉汗的军事活动以及塔什干一带的政治态势。^④由此可见,卫拉特蒙古人对清朝获取中亚的信息情报也曾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余 论

面对广袤疆域与多元族群,“同文”与“大一统”乃是清朝统治者的“治道”所在。乾隆中后期,汉、满、蒙古、藏、察合台、波斯等语文共同交汇于政治运作中,清代多语文政治文化臻于极盛。^⑤清朝官方主持纂修的《钦定西域同文志》等大型辞书,便是推行多语文政治,促成“同文之盛”的产物。^⑥与此相应的是,清朝对中亚各部颁发多语文敕谕的机制逐渐完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朝设立回子官学,由内务府“回子营”及在京穆斯林中挑选学童就读,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改为回疆官学。^⑦在统一新疆前后,清朝亦留心挑选译员。吐鲁番伯克后裔白和卓迁居京师,为清朝处理察合台文、波斯文公文平添助力。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朝设立托忒学,与蒙古学、唐古忒学共附于咸安宫官学下,为托忒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至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向中亚哈萨克、浩罕等部颁发多语文敕谕的机制已相当程式化,其运作流程为:军机处先以满文拟写敕谕奏报皇帝,奉旨后,再交给内阁蒙古堂写定。^⑧敕谕的译写,一般由内务府自“回子营”传送回子译员到内阁蒙古堂译写。^⑨

总之,清朝在统一新疆以及与中亚诸部族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和发挥蒙古语文在中亚的历史作用,充分发挥其沟通交往的现实功用。有清一代,蒙古语文在清代新疆地方的政治生活中也占有着重要位置,具有很高的实用性。蒙古语文在清乾隆朝统治新疆、经略中亚时期重要的沟通媒介作用不容忽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托忒蒙古文书信文本,将是未来清史学界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

① 英卡尔·巴合朱力:《18世纪中后期清朝对浩罕政治军事信息的搜集与认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第85-98页。

② 《寄谕伊犁将军明瑞等著不必为防霍罕等部联手图强派人暗中离间》,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84页。

③ 《自安集延逃来厄鲁特等送伊犁安置及其所供浩罕情形折》,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初七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6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3页。

④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人前往塔什干勒索贡物等情折》,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六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4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50页。

⑤ 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82-94页。

⑥ 乌云毕力格:《〈钦定西域同文志〉若干问题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2-26页。

⑦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200《内务府·回疆官学》,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

⑧ 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办理军机处·军机大臣职掌》,线装书局影印本,2006年。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档案号:05-13-002-001754-0074。

附录:

表1 清政府向中亚各部颁发托忒蒙古文敕书情况概览表

敕发对象	颁发时间	资料来源
哈萨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正月十六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傅恒等奏为撰写给阿布赉敕谕进呈经御览后填写赏赐物品龙缎黄纸包裹加盖满洲托忒文印送出事》,档案号:03-18-009-000030-0001-0009。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处奏将颁给哈萨克汗阿布赉托忒文敕谕呈览片》,档案号:03-02-000-002314-0014-0000。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永贵奏将敕谕译成托忒文派员送交哈萨克王阿布勒必斯折》,档案号:03-02-000-002334-0013-0000。
浩罕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八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给浩罕额尔德尼伯克敕书》,档案号:03-02-000-002102-0019-0000。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辽宁省博物馆藏,参见李勤璞:《乾隆五十三年给霍罕伯克三体敕谕满洲文试译》,《满语研究》1999年第2期,第90页。
巴达克山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处奏拟写给巴达克山汗托忒文敕书呈览片》,档案号:03-02-000-001803-0014-0000。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七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处奏将给巴达克山苏勒坦沙之谕旨译成托忒回文恭呈御览片》,档案号:03-02-000-002098-0015-0000。
爱乌罕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二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处奏请将赏给爱乌罕使臣和卓米尔哈之药品用途译成托特回子文片》,档案号:03-02-000-002009-0019-0000。
布鲁特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傅恒奏将回文托忒文之上谕恭呈预览后装匣咨送兆惠处》,档案号:03-02-000-001682-0031-0000。

[责任编辑:那次克道尔吉]

Beijing in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seventh year of Qianlong, in the name of pilgrimages, actually requested Qianlong Emperor permission to go to Tibet to boil tea. Although Emperor Qianlong showed a tolerant attitude and granted the request of Jungar under the pleas of Choinamka and the others, in view of the lesson that the Jungar envoys had returned for no reason before, he was very careful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number, time and route of the envoys to go into Tibet to boil tea, and took adequate measures to deal with it.

The Process of the Mongolian Princes' Withdrawal from Mongol-Goryeo Interaction: Reconsideration of the Death of Zhuguyu MA Hairuo(041)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death of Zhuguyu, a Mongolian ambassador, in 1224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Mongolian Khan Ögedei's attack on Goryeo in 1231. But materials show that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for Mongolian expedition. Zhuguyu is the envoy of Genghis Khan's brother, Otchigin. The princes represented by Otchigin had once negotiated with Koryeo in parallel with the Mongolian Great Khan. After 1231, the power of the left wing princes gradually withdrew from Mongol-Goryeo interaction, and up to the time of Kublai Khan, the Mongolian Khan completely controlled Mongol-Goryeo interactio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and the Qing Dynasty's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 Yingkaer Bahezuli(056)

Qing Dynasty actively took advantage of Mongolian language with its standing and function to become highly important tool of communicat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unifying Xinjiang and building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 The role of Mongolian language in communicating Qing and Central Asia, presents the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of Qing dynasty with surrounding peoples. This essay is to make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dict of Qing emperors to the Central Asian rulers, and discuss the role of the Mongolian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ruling Xinjiang and managing the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

Character Portrayal of County Officials in Qusibei Inscriptions in Yuan Dynasty GAO Baoyu(065)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qusibei inscriptions was county-level officials, and its content mostly praises the poli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ruling activities of county-level officials. The use of qusibei inscription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ounty-level officials in the Yuan Dynasty.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qusibei inscriptions not only portrayed county-level officials, but also served as a process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monument. Shaping the image of official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value of qusibei inscriptions in the local society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it is also a cultural choice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Ölet Battalion in Ili in Qing Dynasty Khasaghai Buyanbatu(072)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Xinjiang, Qing Court made up a defense system to strengthen northwest defense. The Ölet Battalion in Ili was a component of the Xinjiang Garrison Eight Bann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